

文化

論一九九九年前後澳門 文化特徵之保留及發展^{*}

魏美昌^{**}

一、保留及發展澳門文化特徵之需要

在最近三年的澳門過渡期間，人們似注重加速解決政治問題，諸如公務員本地化，現存法律的清理和翻譯，中文作為行政當局官方語言的擴大使用，甚至土生葡人的國籍等。在經濟方面，除了需要解決低科技向高科技的工業轉型外，仍須解決的尚有供過於求的地產市場以及改善澳門作為中國第二自由港的基礎設施等問題。

毫無疑問，對於澳門的將來這些都是重大問題，而且在一九九九年前需要有妥善的解決辦法。然而，倘若澳門希望在主權移交後擁有一個美好的將來，那麼，一九九九年之前，在教育及文化領域方面，仍有一些重大的問題是非常值得澳門內外的人士及有關當局重視的。

這是一個與我們鄰埠競爭而繼續生存的問題。因為澳門是彈丸之地，人口稀少¹，在金融及商業方面不可能與香港競爭，而在人力資源及市場規模方面，更不能與中國其他城市競爭。

* 本文是一九九六年三月十八日至十九日澳門大學舉辦關於澳門與珠江三角洲研討會上發表的論文。

** 《行政》雜誌社長助理、澳門文化司署副司長

1 由一九一零年開始，特別是八、九十年代，澳門土地的增加十分迅速，填海由11平方公里增加到現時的20多平方公里。在本世紀末，於南灣、北安及路氹之間的區域所進行的填海工程，將使澳門土地增加5到6平方公里，但這些土地的增加，不能和香港（1,000多平方公里）或珠海的（1,200多平方公里）相比。由於澳門面積細小，資源有限，因此人口短期不可能超過五十萬（根據官方統計，於一九九一年期間，澳門居民有三十五萬五千六百九十三人，流動性居民有四萬七千人，到了一九九六年總人口只增加百分之十六，即四十五萬人）。即使加上氹仔和路環在下一世紀的迅速發展，澳門人口亦很難超過一百萬。

澳門於七十年代由勞工密集性工業的上升趨勢到了八十及九十年代便漸趨衰落，於是經濟學家及專家們開始另謀出路，試圖為澳門確立一個模式，不單單是一個賭城²，而且更需要成為珠江三角洲西部地區一個戰略樞紐。顯而易見，如果澳門在信息、通訊、交通、金融、技術及管理經驗等方面加強國際化的程度，則可吸引更多投資者和遊客。

目前，澳門國際機場已在運作中，日後，當鐵路或高速公路能通達中國腹地，再加上深水港能大力改善，那時，澳門能否成為一個區域性的戰略樞紐呢？答案仍是否定的。

現代的基礎設施應配合現代的上層建築。每一個國家、地區或城市的上層建築都有其本身的特徵，即文化特徵，而有別於其他地區。作為一個城市，如果澳門只對其基本建設或硬件加以現代化而忽略對其文化特徵即軟件的改善，那麼，澳門將逐漸失去其文化特徵，與中國其他城市沒有兩樣。與其他鄰近城市相比，由於澳門經濟能力薄弱而珠海的面積、人口及資源³都比澳門優越，因此澳門將輕易地淪為珠海的附屬物。那時，在澳門實行“一國兩制”的構想將完全失去意義。

香港與深圳的情況並不一樣，因為在經濟及財政上香港比深圳處於強勢，因而使深圳變得“香港化”了。而在珠江另一邊，一旦邊境障礙被消除，亦將容易出現澳門“珠海化”。

因此，澳門極需全力保留其文化特徵。《中葡聯合聲明》及《澳門基本法》已為此而奠定了法律基礎。換言之，一九九九年後，建基於文化特徵的澳門自治將得到法律保障。然而，現在若不盡量採取具體措施以保留及發展上述文化特徵，該法律保障將會流於形式。事實上，與鄰近城市包括香港相比，澳門的歷史較悠久，這一點，澳門是佔盡優勢的。

雖然澳門地小勢弱，但一九九九年以後，只要在澳門內外採取一些有效措施以保留及發展澳門文化特徵，使澳門成為一個能服務於中國及世界其他地區，尤其是聯繫歐洲及拉丁語系國家的戰略樞紐（這個文化紐帶是在澳門四個半世紀的東西文化交流之中形成的），那麼澳門在與鄰近地區競爭中，仍可發展及繼續生存。

-
2. 隨着八十年代末期加工工業的衰落，以及一九九四年房地產業的蕭條，第三產業（旅遊業、銀行業和其他服務行業）的比例繼續上升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七成以上。如果澳門能實行現代化，將低科技轉為中或高科技，加工業才可重新起飛。但服務行業及旅遊業是可以繼續昌盛的，其中賭博業仍佔公共收入的約四成，或旅遊業總收入之七成。這個比例是可透過文化旅遊的發展而改變，本文以下部分將對此進行分析。
 - 3 珠海市佔地7, 555平方公里，其中1, 200平方公里是陸地，其餘為水域。總人口約六十萬。經濟特區於一九八零年成立，一九八三年，面積由6. 81平方公里增加至1 5555平方公里，而在一九八八年則增至121平方公里。工業從零開始，在首十年，每年工業增長是38. 5%，外資增長是21. 3%。幾乎一半的製成品出口外銷。大約在一九九五年，其國內生產總值達到八十億人民幣，不到澳門國內生產總值的五分之一，但在近五年的每年增長率，差不多是澳門的兩倍。一九九五年，珠海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二千美元，在中國大陸屬最高之一，儘管澳門比它高七倍。雖然兩地人口相差不遠，但珠海有更多的空間可以吸納來自中國其他地方的移民。如果澳門經濟不能迅速增長，在十至十五年內，便會被珠海超越。

換言之，如果澳門的文化特徵得到充分發展，那麼，《聯合聲明》及《基本法》預期的高度自治便可實現。

二、何謂澳門文化特徵？

所謂特徵就是與眾不同，在中國或世界其他地方難於找到的。

此特徵在漫長的四個半世紀的歷史長河裡孕育滋長，是帶有濃厚的中華拉丁色彩的東西方文化之融合，有別於具更短暫歷史和背景在香港央格魯撒克遜文化，同樣地，亦不同於從未向西方長久直接開放的中國嶺南文化⁴。

這不單只是東方及西方元素的機械式匯聚，而是兩者產生化學作用的混合體，在土生葡人文化中清楚地顯示出來：其語言、烹飪、藝術及風俗習慣，一代一代留傳下去，形成一個有別於純正的華人社群及葡人社群的獨一無二的土生葡人社群。他們在澳門的歷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們的利益得到了《基本法》⁵的保證。

自從葡萄牙人利用澳門作為商業貿易中心和傳教中心，東西方的元素在完全平等的條件下相互影響。葡萄牙文化無法“同化”中國文化，與非洲的情況恰恰相反，因那裡的文明程度不高。中國人亦無法拒絕西方文化，因為在科學及技術領域內，西方佔了優勢。這種情況與香港對中國人要強迫接受英國文化的情況是截然不同的。

在澳門我們可體驗到的是互相尊重、互相容忍、取長補短，從而產生一個興盛的文化交流。創辦於約四世紀前的澳門聖保祿學院，就是一個好例子。這所學院是東方第一所西方式大學。耶穌會士從西方到澳門首先必須學習中國語言、風俗習慣及中國文化，也學習日本的語言、風俗習慣及其他東方文化，因此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優秀的漢學家。另一方面，中國人進入此學院修讀拉丁文及研究西方文化，成為精通西方文明的第一代專家。

雖然學習宗旨是傳播宗教，但耶穌會士和有識之士，例如西方的利瑪竇、徐日昇、金尼閣、湯若望、南懷仁等神父及其同道的中國學者徐光啟、李之藻、梅文鼎、何國棟、吳歷等等，他們互相合作促成史無前例的東西方文化交流，藉此將數學、天文學、物理學、建築學、醫學、軍械學、音樂、西方藝術等傳入東方，並向西方推介東方的哲學、醫學、繪畫、茶道、瓷器、漆器及許多其他中國文化的精華。

無論在東方或西方，這個廣袤而深遠的交流對社會的衝擊是如此巨大，以致產生重大的社會改革。

4. 嶺南是一個歷史概念，主要包括所有以廣東話為方言的地方，即廣東省和廣西省。嶺南人來自密克羅尼西亞，在二、三千年前從印度支那遷往北部。此後，來自北方的客家人向南遷移，而其中一部分人留在廣東，與一部分福建人聚合一起，成為現時的潮州人，因此，廣東有三種主要方言：廣東話、客家話及潮州話。它們是不同的文化群，同屬於嶺南文化，亦即華南文化。香港及澳門文化都是嶺南文化的分支，然而，香港及澳門文化各有不同的特徵，因為它們直接與西方文化接觸。

5. 請參閱《澳門基本法》第四十二條。

一方面，上述交流推動了西方的啟蒙運動，使法國、德國及意大利的革命走向巔峰，引發了工業革命，開創了個洛可可的新藝術風格。

另一方面，中國進步思想家，如接受基督教思想的太平天國農民革命領袖洪秀全；對抗販賣鴉片的民族英雄林則徐；策劃中國自強運動的魏源；君主立憲制度的提倡者康有為及梁啟超；主張現代化貿易的鄭觀應；更不能不提中華民國始創人孫中山先生，所有這些傑出的領袖透過澳門都有機會接觸外國進步思想，這種思想往往通過傳教士滲入封閉的中國。在消化這些外來的“精神食糧”後，以改革社會為宗旨的新思潮，開始在中國及日本的土壤萌芽，動搖了幾千年單一而封閉的舊傳統文化架構，同時亦揭開了多元化及開放的新紀元的序幕，導致科學、技術及教育的新躍進，使東方和西方面臨一系列的新挑戰。

東西方文化的互相影響永遠循環不息，構成螺旋式向上運動。澳門自十六、十七世紀成為這個循環中的一個重要交匯點、橋樑及通道而感到自豪。聖保祿教堂前壁（牌坊）的清晰圖象、雕塑和文字，就是這個文化交流的悠久見證，這個古跡已成為我們城市的標誌，象徵着共存、互相尊重和寬容的精神。

這種共存、互相尊重及對不同文化包容的精神在澳門深厚地紮根，成為一個重要的傳統，而這種傳統在澳門較在鄰近地區更為顯著，體現出和諧多於衝突，平衡多於對抗，包容多於分離，在多元中保持穩定。

這種傳統可追溯至明、清兩朝葡萄牙人在中國這個最早的“經濟、文化特區”定居的時期。當時，葡萄牙人在沒有訴諸武力之情況下管治澳門及保持中國對澳門的主權，包括司法權及海關權。直至鴉片戰爭，葡萄牙人乘清政府的貪污腐敗和軟弱無能而鑽了空子，分別向南、北擴張其地盤，在驅逐澳門的中國官員的時候，亦造成了一些流血事件⁶。然而，上述情況絕不能與英國人佔領香港所使用之暴力相比。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的所謂“一二·三”事件中“紅衛兵”造反與葡萄牙人對抗，所發生的衝突與香港類似事件比較，事態顯得更為溫和，葡萄牙人比英國人表現出更為容忍。一九七九年，當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葡國重建外交關係時，葡萄牙人承認澳門是葡國管治的中國領土，因此，與英國管治香港的殖民地地位是不同的。葡國於“四·二五”革命後，透過一九七六年的新組織章程，授予澳門更大程度的自治。從一九八四年，本地的中國居民比香港的中國居民率先取得直選或間選的投票權。中葡關於澳門未來的談判也比鄰近的英國殖民地談判的進度更快，會談的次數及爭論也較少。

分析這兩種民族、兩種行政及司法體制以及兩種不同的政治及思想體系和平共處的悠久歷史，就容易地理解澳門過渡期的種種問題，包括興建澳門國際機場與香港相比比較容易解決，避免許多混亂，彼此都能堅持互相尊重、互諒互讓。這也是中葡兩國良好關係的基礎，就是“澳門模式”，與充滿衝突和磨擦的“香港模式”截然不同。

6. 一八四二年，香港被英國人佔領之後，當時澳門總督亞馬留開始使用武力向北擴展其勢力，並向中國船隻開火，驅趕駐澳的中國官員，摧毀中國居民的墓地，最後，他被農民刺殺身亡，其後在一八四九年，該農民亦被廣東總督斬首而死。一九一零年，中葡在劃分澳門邊界的談判宣告破裂，葡萄牙人採用武力佔領路環並殺害當地漁民。

這也涉及法律文化及政治文化不同的問題。一個是建基於英式習慣法之央格魯撒克遜文化，而另一個是以歐洲大陸法⁷為基礎之拉丁文化。

這個共存、互相尊重及互相諒解的模式強烈地反映在不同宗教——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及巴哈伊教之間的關係上。不同宗教在教堂、廟宇、清真寺進行各自的宗教信仰儀式，教徒以友善方式和睦相處，從來沒有發生過流血衝突事件。然而在中國大陸、日本、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愛爾蘭、波斯尼亞、中東以及世界上其他地方，宗教性質的流血衝突是不可避免的。眾多宗教的和平共處可與比澳門還古老的海上絲綢之路的出發點，福建古老沿海城市泉州⁸的各宗教和平共處互相媲美，但澳門比泉州更能持久而且沒有間斷過。宗教自由在基本法內得到保證，希望在一九九九年之後能夠延續。

東西方文化互相滲透成為我們在澳門日常生活之一部分。異族通婚繼續在更廣泛的範圍⁹內進行，在同一天裡人們往往以中西合璧的方式舉行婚禮。可以察覺得到，一批善男信女既參加花地瑪聖母聖像遊行又參加在農曆新年大除夕朝拜媽祖¹⁰以求興旺與幸運。同樣地，各社群之間不分彼此都能一起慶祝東西方節日，並因而帶來了比鄰近地區更多的公眾假期。在公開的儀式上，主教及佛教的高僧一起出席為本澳的盛事祈福。這種傳統在世界其他地方是少見的。

澳門著名的拉丁風格結合中國傳統風格的城市建築模式是文化互相滲透的具體見證。這些可見於教堂及廟宇、堡壘及塔亭、房屋及店鋪、花園及墓地、廣場及小巷的建築藝術，構成獨特的文化遺產。這些遺產由我們文化司署特別部門依據周詳法例¹¹給予保護，確保文物免受狂熱的商業買賣所摧毀，或像香港一樣被石屎森林所吞噬。文物保護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¹²規定，並受聯合國關注。

-
7. 香港及澳門的兩種法律體系的差異，往往被普羅大眾尤其是學者所忽略。事實上，這種差異反映出央格魯撒克遜文化與拉丁文化的巨大差別。目前台灣採用的現代中國法律以及中國大陸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法律，實際上較接近淵源於古羅馬法的歐洲大陸法。倘若澳門，而不是香港，成為中國、歐洲及拉丁世界的橋樑，那麼，這個差異對未來亦是十分重要的。
 8. 泉州是一個位於接近福建現代港口廈門北部的中國古老港口城市。從唐朝（七世紀）至明朝末年（十六世紀）是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港口，也是中國著名航海家鄭和沿着海上絲綢之路向南向西旅程的出發點。航海把中東、印度、東南亞，及其後的葡國、西班牙的文化及宗教傳入泉州，使該港口繁盛，因而成為一個多種文化的港口城市。但當中國重新關閉其門戶，在外貿上只開放廣州及澳門，泉州便立即衰落。鴉片戰爭後，中國開闢了其他港口城市，泉州已大為落後，其多種文化的興盛只可留作昔日的回憶。
 9. 根據葡國人類學家賈淵教授於一九九零年初的研究報告，中國人與葡國人士或土生葡人與中國人之間的通婚在近幾十年增長很多，顯示兩方文化的開放性有所增強。
 10. 漁民及航海家的守護神媽祖起源於福建。遠在葡萄牙人來澳門定居之前，媽閣廟是由早期來澳移民的福建人興建，一般來說，媽祖已成為保佑及興旺的象徵，不單只受到華人社群尊重，而且亦受到土生葡人 / 葡萄牙人社群尊重。
 11. 直至一九七六年，澳門當局開始立法以確保文化古蹟免受摧毀及拆卸。在一九八二年澳門文化司署設立後，隨即將具有歷史文化價值的建築物及古蹟進行分類，制訂嚴格法律及規章給予保護，並對那些建築物的所有人給予金錢賠償。
 12. 請參閱《澳門基本法》第一百二十五條。

我們比香港及中國大陸其他地方較幸運，因為這些文化遺產，連同保存在教堂、廟宇、洋行、當舖等屬於公共和私人檔案的書面記錄，加上在中國大陸已經失傳的某些習俗，能夠完整無缺地保存下來，這是由於歷史上澳門的特殊地位，成功地避過世界大戰、內戰和中國現代史上的各種極端主義運動的破壞。有一部分不久將在澳門歷史博物館內展出。

澳門本身就是一個活生生的博物館及人類文明的巨大寶庫。自始以來，它期待着人們繼續探索及發展，對學術研究及發展文化旅遊提供獨特的豐富的資源。

一位境外的華人學者，在探訪澳門時，曾對澳門作出一個深刻印象的描述。他說，如果香港已成為“東方之珠”，澳門則是一顆有待琢磨的鑽石，經適當加工，其價值及光澤將超過一顆珍珠。

然而，倘若無人對這顆鑽石加以珍惜，又或對在最近辯論中可明顯覺察到的極端民族主義和極左思潮加以容忍，讓此種思潮在一九九九年後佔上風的話，那麼，這顆鑽石有逐漸蛻變成一塊普通石頭的危險。

根據這種思潮，澳門文化遺產中的拉丁色彩及中國的舊傳統應視為殖民主義和封建主義垃圾而加以拋棄。倘若讓葡文很快自然消失；若把居住澳門的土生葡人當作外國人；如果允許現存的文物被拆掉或允許徹底改變其歷史文化價值；假若中國法律取替葡國大陸法；假如宗教自由被蠶食和限制；倘若就像對待有害的迷信一樣，禁止古老的中國風俗習慣流傳，等等，澳門將會變成怎麼樣的呢？

顯而易見，如果無人注意琢磨這塊鑽石，它的非凡光澤永不會顯露出來，而一顆未經琢磨的鑽石永不能與一顆珍珠爭妍鬥麗。這樣，這顆鑽石遲早會蛻變成粗糙的石頭。

可喜的是，我們對此不必過度悲觀，因為在澳門內外的華人社會中越來越多的人已經開始理解保留及發展澳門文化特徵的需要。北京當局及本地華人社會，在未來特別行政區政府內宜推選或委任一些對澳門文化財富有認識的務實人材擔任重要職務，以保證這顆鑽石不會蛻變成一塊無價值的石頭。

然而，一九九九年之前仍有大量工作需要去做，以保留及發展澳門文化特徵及建立一個保證一九九九年後能延續下去的基礎。

三、保留及發展澳門文化特徵的良策

經過一連串的討論及研究，下列各點得到越來越多的共識，並視之為保留及發展澳門文化特徵的正確措施：

3.1 加強調查研究

在缺乏研究的基礎上，對澳門文化特徵難於作出科學的詮釋。事實上，研究還是處於初期階段，因為它是跨越學科的，包括史學、人類學、社會學、語言學、文學、法學、教育學、政治學、經濟學、美學、音樂、神學、哲學、建築學、民俗學及烹飪

學等。詳細闡明一個地區的文化特徵是一項專門的學問。現在人們已在創立香港學、深圳學、嶺南學及泉州學，而中國其他城市和地區，也盛行這類地區性的研究。但是，在澳門設立澳門學這門學科仍然是一件遙遠的事情，因為我們的大學及其他機構在這方面做得太少，而本地年青學者，尤其是攻讀人文學科的，也寥寥可數。

澳門文化司署一直鼓勵及津貼澳門及海外的學者作出此類的研究，儘管其範圍仍然狹小和有限，研究的成果以三種語言在文化雜誌上刊登。澳門大學在不久前開始拓展人文學科的研究生課程，鼓勵年青學者對澳門的題材作出研究，儘管還有不少困難。澳門基金會及東方基金會向來亦有不少出版關於澳門題材的書籍，儘管學術水平還不高。《行政》雜誌及本地法學、經濟學雜誌不乏有水準的論文。

為了對澳門的特色及其在本地區的作用加深認識，在澳門一向舉辦很多國際性研討會。舉行此類型的研討會是非常重要的，以便世界上有更多人認識澳門及其區域性角色、其模式及其對世界的意義，尤其是此刻討論美國哈佛大學韓丁頓教授關於對下一世紀東西方之間的“文明衝突”，即基督教與儒教——伊斯蘭教聯盟之間的“文明衝突”之推測。

澳門模式可輕而易舉地證明上述推測是不正確的。不妨提及澳門的一位摯友，世界著名學者日本高僧池田大作，他呼籲以容忍及對話來代替文明衝突：“澳門例子清楚表明不同的文化是可以和平共存的。雖然澳門地方細小，但活力充沛，它的歷史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結晶。這是人類步向全球化及‘航海大發現’新紀元的最佳希望”¹³。

3.2 大力推動公民教育

一旦澳門的特徵不僅為少數的政治家及學者，而且為各個階層的居民，尤其是年青一代所認識並且準備為捍衛它而努力，那麼這種特色才得以保留下來。

事實上，大部分居民是來自中國內地的新移民或世界各地的海外華人，他們在澳門幾乎沒有紮根亦沒有歸屬感。雖然土生葡人已在此根深蒂固地成長，但自從一九四九年甚至更早，他們不斷移居海外，而留下來的人對澳門前途仍存有疑問。過去，公民教育完全被忽略，在餘下幾年的過渡期間，公民教育應擺在優先的地位，讓居民，尤其是年青一代透徹理解澳門的特徵及其未來，以身為澳門市民¹⁴而感到自豪。

對市民宣傳澳門基本法固然重要，但還要讓他們認識澳門的過去及現在，包括歷史、地理、法律及政治制度、文化及宗教等。應該為小學、中學、大學的學生和普通市民撰寫教科書及大量關於此題材的文章、小冊子及刊物。這些題材應作為必修課納入課程，使他們能夠對澳門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有一個清晰的認識。

13. 引述自池田大作於一九九一年第二次訪澳期間的講話。他是國際創價學會的主席，該機構有不同類型的業務遍佈全球。他出版了許多關於宗教、文化、和平、人道主義的書籍並翻譯成多種語言。

14. 由於澳門人口的流動性大，再加上大量的新移民而且他們又缺乏公民教育，因此長期以來，澳門的華人自稱為“中國人”而很少自稱“澳門人”，與香港人自稱為“香港人”而感到自豪的情況剛剛相反。

應鼓勵反映本地題材及事物的繪畫及攝影、錄影及電影、音樂及舞蹈，話劇及戲劇，並通過比賽、展覽和表演加以推動。

在公民教育方面，有關當局應與本地學校、民間和文化團體保持密切的聯繫，並互相合作。可喜的是，近期在這方面已經取得了良好的進展。

也應鼓勵公眾協助興建本澳的歷史博物館，因為它和海事博物館一樣是公民教育的重要工具。

3.3 充分利用及改善澳門的文化遺產

政府不遺餘力，動用巨款，以確保具有極高文化、藝術及歷史價值之遺址受到保護。近期崗頂前地及下環街前地（阿婆井前地¹⁵）之修葺，便是一些例子，以吸引更多的遊客，而福隆新街及鄭家大屋¹⁶之修葺亦在磋商中。此外，有需要修葺之遺址還很多，除可使澳門的老區成為一個活的博物館以供遊客參觀外，同時亦可為公民教育作出貢獻，這是一項既深具價值，又需要延伸至一九九九年後的宏偉計劃。

從現時澳門經濟衰退中，可以明顯地看到，旅遊業仍然是一枝獨秀，它的大部分收入，主要來自賭場及博彩業。但是本澳居民及政府卻很希望改變博彩與文化旅遊之比例，發展更多文化旅遊性質之項目，藉以增加後者之比例，一如拉斯維加斯及蒙地卡羅，那裡建設了各種不同的主題公園，開闢了很多旅遊景點以吸引不同年齡的遊客，賭客及非賭客，讓他們能領略到當地文化，同時亦可提高酒店入住率¹⁷，帶動飲食業及商業之興旺。

主題公園之興建已成為近日最激烈之辯論話題。問題在於要先了解應建設哪一類型公園，是否應該模仿中國及世界其他地區現有主題公園模式，例如香港的海洋公園和宋城、深圳的錦繡中華和世界之窗，或美國、日本、巴黎的迪士尼樂園呢？答案是絕對否定的。因為我們所需要的，是一些與眾不同的、以我們自己的歷史、文化為基礎，且具有濃厚中華拉丁組合之景點。

15. 位於市政廳後面高地的崗頂前地是古老拉丁風格的典型。環繞前地的建築物有奧斯定聖堂、崗頂劇院（根據古典劇院的原始風格翻新及修葺）、何東圖書館及視覺藝術學校。阿婆井前地是接近內港的其中一個最古老的葡萄牙人聚居的地方，保留着土生葡人家庭曾在此區生活的許多回憶。最近，曾將圍繞着此前地的房屋進行修葺工程（本文出版時，該工程已完成），並在該處重建一口井（中國人稱之為“阿婆井”阿婆的井）。很多已遍佈世界各地的著名土生葡人可在阿婆井前地尋找其根源。

16. Rua da Felicidade, 中文稱福隆新街，是鴉片戰爭後娼妓經常出現的著名紅燈區。後來禁娼，該處成為一個擁有各種傳統餐廳的最古老飲食業的地方。鄭家大屋是中國清朝官員鄭觀應的私人住宅，他亦是孫中山先生的老朋友，以提倡自由貿易主義而著稱。由於鄭家大屋是中國南方失傳已久的傳統風格建築，因此，是這種建築風格獨一無二的範例。

17. 最近，雖然在澳門興建許多酒店，但在機場開幕前，入住率一直偏低（約百分之六十，於一九九四年來澳旅客逗留澳門平均為0.9日）。這些數字十分低，主要是由於澳門除了賭場及“夜總會”外，並沒有為旅客設置其他的娛樂基本設施，根據最近統計，超過半數的旅客不喜歡在上述場所出入。

透過吸收我們歷史的精粹，並進行大量的研究和創新，這些景點應結合現代科技及我們文化特徵，具有可吸引來自亞太區、中國大陸、台灣以至西方之不同種類遊客的主題。為避免有限資源的重複使用及浪費，計劃之相互協調極為重要，而大部分項目應來自私人投資。

如果我們可以成功地發展以吸引遊客為目的之主題公園，澳門便可擺脫作為香港旅遊“影子”的形象，而變成珠江三角洲西部地區的一個旅遊“龍頭”，具有與亞太其他地區不同的旅遊特色。這樣，才可在短時間內，把澳門從賭城之形象轉變為文化之都。

在旅遊推廣方面，需要培養和訓練一支合資格的導遊隊伍，這些導遊應該精通澳門歷史和文化，有能力及活力，能以不同語言向遊客詳細解釋澳門之文化特徵、古跡和遺址。為了達到旅遊推廣這項工作之要求，必須印製不同種類之旅遊手冊和小冊子。

3.4 使用和推廣雙語制及多語制

雙語的使用是保留我們文化特色的核心。由於有需要保留現有行政、立法及司法體制，而這些體制須以雙語確保其正常運作和質素，因此有必要維持葡語作為一九九九年後的官方語言，一如基本法所規定。為此，需要對那些決定於一九九九年後留澳服務，特別是母語為中文之公務員加強語言培訓，並在推行本地化進程中將合格的公務員晉升至重要職位。

葡語之使用並非只限於以上三個範疇，在人文科學領域方面之研究，特別是澳門歷史、文學、藝術及建築等，亦需要懂葡語。如澳門希望維持和發展與葡語系國家之友好關係，以及商業及文化關係，葡語之使用亦同樣重要。

總之，澳門有百分之三之人口操不同程度的葡語，這種珍貴的文化財富，在中國其他地方是無法找到的，所以無論在質與量方面都應該維持，擴大及改善葡語的學習和使用。

首先要在中等或高等學校培養一大批教師隊伍，專為華語學生教授葡文作為第二或第三外語，而且要為不同類型的研究人員講授葡語專業語言，而葡籍老師應着重教授高等程度的學生。

在行政方面中文使用亦十分重要，必須繼續消除在平等使用葡文和中文方面存在的現有障礙。對於那些希望在一九九九年後留澳的葡萄牙人，學習中文是首要的。同樣，那些只懂粵語的葡萄牙人和中國人，也應學習普通話，以便改善他們講寫中文的能力，從而普遍提高他們的中文水平，因為澳門的中文水平比中國大陸要低得多。

很明顯，要求所有公務員精通雙語是十分困難的。但這方面的不足可由優秀的傳譯員及優質的翻譯精英來彌補。應該為他們提供高級翻譯課程，以提高水平。

應該分別編輯一些好的課本給初學者和程度較高的學生，如新版詞典和各類實用詞彙手冊。對改進語言教學方法的研究，向來都是一個被忽略的關鍵性問題。

澳門既然是一個發展迅速的自由港，因此，急需繼續加強英語作為國際通用語言的教育。

另外還急需培養懂得多種語言的翻譯員，他們必須精通普通話、葡語和英語，同時具有即時傳譯能力，因為將會有愈來愈多的國際性研討會和會議在澳門舉行，因為澳門是召開這種會議的理想地點。為此，對翻譯員應提供特別的培訓課程以適應新的要求。

最後，澳門的多語制應予以擴大，並且優先擴大至其他拉丁語言，如西班牙文、法文和意大利文，以葡文為基礎學習這些語言是比較容易的。這是由於澳門有需要成為中國與拉丁語系國家之間的自然和特殊的紐帶。

3.5 加強與歐洲及拉丁語系世界的聯繫

一旦分析了澳門的文化遺產及其價值，便可以很容易察覺到澳門本身具有很大潛力，足以成為能將中國與歐洲及佔全球人口六分之一的拉丁語系國家和地區的距離拉近的中介。

中國有需要這樣做因其對外關係不平衡：過份側重與英語國家的接觸，而將歐洲和其他拉丁語系國家放在次要位置¹⁸。中國一直以來都在調整策略，目的為加強與歐洲及拉丁國家的聯繫。

如果澳門可以提供必需的資訊、研究和諮詢服務，應該是這個策略下的理想紐帶。同時澳門亦已具備達到這個目標的基礎，因為它的語言、法律、國籍（澳門四分之一居民擁有葡籍及在歐盟任何一國居住之權利）以及無論是歷史或文化關係都與歐洲相近。因此，歐盟選擇了澳門作為其遠東基地，並於一九九二年簽訂了一項優惠協議¹⁹，隨後又在澳門設立了歐洲資訊中心。

由於缺乏推廣，歐盟給予澳門的有關投資、商業、資訊、技術轉移及培訓等優惠待遇並沒充分地加以利用，而這些優惠在香港及亞太其他地方是無法享用的。通過更多的研究和推廣這些優惠，澳門可以有更大的發展。

一九九六年二月，澳門歐洲研究學院順利落成，它的目的是推行一些有關歐盟之研究計劃，並在亞太區尤其是中國宣傳有關歐盟的信息。

澳門作為歐洲與中國的中介角色，已被歐洲跨文化活動所確認和認同，經過兩年的研究和接觸，設立了澳門中歐企業家俱樂部，其目的是建立龐大的人際關係網絡，以便透過澳門促進中、歐貿易。澳門是中國唯一能令歐洲人在感情上可找到相近文化的地方，而在香港這種感情往往被嚴謹的金融和商業規則所淹沒。

在下一世紀，拉丁美洲國家，特別是巴西，將會迅速地朝着第三世界經濟強國地位邁進，它現正努力加強與亞太地區之聯繫，特別是中國。

18. 遍佈歐洲南部、非洲、亞洲及拉丁美洲的拉丁語言國家、地區和城市超過八十個，佔全球人口六分之一，其中大部分仍處於發展中的階段，例如巴西，就很有可能成為下一世紀第五個經濟強國。然而，這些國家只佔中國對外貿易百分之七點七，外國投資的百分之一點二。

19. 該協議為期五年，可續期，並期望延續超越一九九九年。

透過對葡國、西班牙即伊比利亞半島的研究，與拉丁美洲國家的聯繫將會更為緊密，目前中國仍未有此項研究，但在澳門則比較容易進行。

另一項計劃就是設立中華拉丁基金會，這個機構屬私人性質並可跨越一九九九年，目的為協調和發展多項功能：1. 設立有關澳門、中國、亞太地區和歐洲國家的廣泛資料庫，並且不斷進行更新；2. 對澳門——中國——拉丁語系國家與澳門——亞洲——拉丁語系國家之間的關係雙向研究；3. 把澳門建成區域性的語言培訓基地，一方面讓亞洲人學習葡語和其他拉丁語言並進修拉丁文化，另一方面讓拉丁國家及亞太地區國家的人學習漢語和中國文化，成為漢學家。4. 提供諮詢，以促進中國、澳門、拉丁語系國家之間的商業及文化來往。

在澳門這個地方，中國、歐洲以及拉丁世界的人可以就經濟學、社會學、工程學、城市規劃、海上交通、商業等方面，在完全自由的環境下進行對話，塑造及影響各自的社會。總址設在澳門的聯合國大學軟件中心，為達到此目的²⁰，向來都給予我們協助。

四、結語

要達致這個宏偉目標，我們所餘的時間無多。這個目標就是將澳門這顆鑽石雕琢成器，使它發出燦爛奪目的光芒，成為一個吸引來自中國、亞太地區、歐洲及拉丁美洲的學者和遊客的地區。這個目標顯然不是短期內可達到，肯定要跨越一九九九年之後。但我們必需在一九九九年之前的短短幾年開始為這個目標奠定基礎。

因此，我們再不可浪費時間。孜孜不倦的努力，智慧和經驗的不斷積累、各方面的慷慨支持，有限資源的緊密協調，這些都是使澳門在時間、空間和人際關係上保持其橋樑作用的成功關鍵。

20. 澳門的聯合國軟件中心設於一九九二年，與中國、亞太及拉丁美洲國家有良好的聯繫，它的宗旨是對全球發展中的國家提供研究和培訓。

